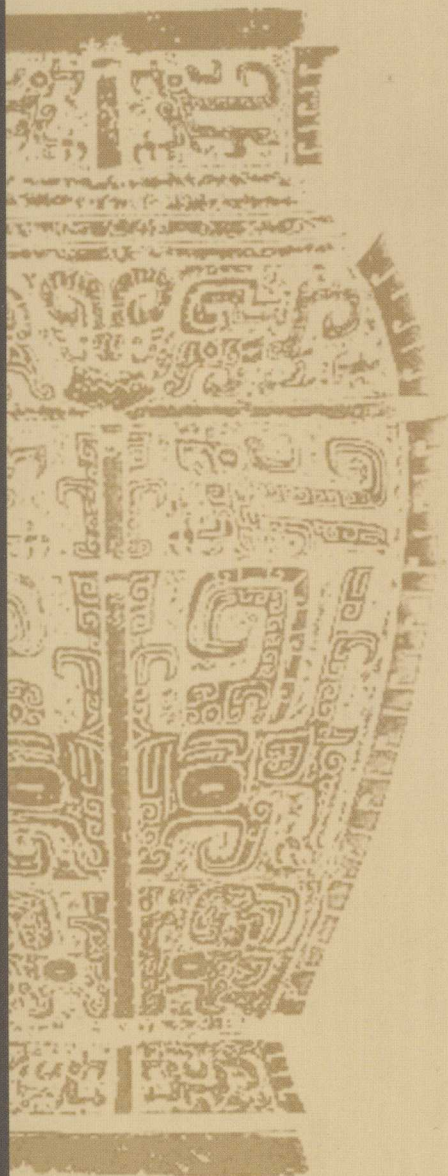


禮記譯註

潛苗金 譯註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禮記譯註

潛苗金 譯註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禮記譯註/潛苗金譯註. -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

2007.2

ISBN 978-7-80715-205-7

I. 禮… II. 潛… III. ①禮儀 - 中國 - 古代 ②禮記 - 譯文 ③禮記 - 注釋 IV. K892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20085 號

禮記譯註

潛苗金 譯註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責任編輯 孫旭明

封面設計 朱爾雅

激光照排 浙江大學出版社電腦排版部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
開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張 25.5

字 數 700 千
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205-7/B·16

定 價 68.00 元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承印廠聯係調換。

例 言

一、本書以清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爲底本。

二、篇目：本書恢復“小戴記”四十六題，四十九篇之舊，即將朱子抽出之《中庸》《大學》重行插入，但此二篇之校定，悉依朱子。

三、題解：題解指陳各篇內容之歸屬，內容之提要及歷來之爭議，故一律重行撰寫，一申鄙意，但文字盡量簡短。

四、分章：古本以釋句爲主，本書則視內容而予“積句成章”，但亦有因篇幅過長而又分者。又爲指稱或檢索方便，各篇各章前用阿拉伯數字標出篇次及章次，而篇章之間用圓點隔開。如第一篇第一章，則標以“1.1”。

五、今注：應注詞語一一列出，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順序，但爲使正文清晰，經文之間不插序號。爲便於理解，於部分今注之前指陳“章旨”。

六、今譯：譯語多用直譯，但爲使上下文意連貫，句間時插數語，用〔〕標出。而句間必要的說明或應刪之語，則用（ ）標出。

序

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我下放農村勞動。原有社會關係突然中斷，舊相識亦罕得爲見。一日，有學生來訪，我殊深驚異。當時風氣，對我等人避之猶恐不及；他竟獨異其趨，大有“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”的氣概。相見後，我說：予所罹之疾，有接觸傳染之虞，慎勿來。今已無話可講，唯認爲中國文化，博大精深，將來必爲國人再認識而獲肯定，曷留意焉。他即辭去。光陰荏苒，彈指已五十年。今忽接其來信，謂所著《禮記譯注》已交浙江古籍出版社，殺青在即。索序于予，並要以中國文化要義爲言。予有難焉。中歲務農二十載，所更非一；調回工作，又忙迫少暇，因而少讀詩書。退休，垂垂老矣。今已望九高齡，學淺年邁，何敢侈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的文化問題。但勢又不能辭。無已，乃思我中國人也，長時間生長于中國文化生命之長河中，對中國文化，雖管窺蠡測，畢竟有所體認。復次，十九世紀中期以來，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衝擊，部份知識分子喪失了自信，認爲要想學習西方文化，必先打倒中國文化，不體念先民創業維艱，整日呵祖罵宗。造成時代思想混亂，使人一切無所適從，馴至出現信仰真空。于此，我感觸良深。今寫出個人對中國文化之體認，時代變化之感觸，與關心此問題者商討，抑亦有助於讀禮耶？

何謂文化？文化者，生活方式也。人是動物，有自然生

命。但人與動物不同。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。此“幾希”爲何？即人有自然生命，同時更有文化生命。動物依本能適應環境而生存；人有思想，製造工具，藉語言更能交流思想。人既能適應環境，又能改造環境，群居協作共享。人爲了生存，個人的生存，更包括其延續生命的下一代生存，創造性勞動，改造環境。在改造環境的同時，亦改變了自身。年長日久，便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。此即文化。民族文化，有其歷史性，是經過長期積累而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從來者漸矣。又有其方向性，一種民族文化，必有其根源思想，決定其發展方向。即使遇到重大挫折，必將奮力克服之，繼續其原有方向前進，決不輕易改變其方向。

茲言中國文化，亦即中華民族之文化。這得從頭說起。我國是古猿人生活過的地方，也是古猿完成其向人類演進過程地之一。這從地下發掘的古猿化石可作充分的憑證。

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，統稱中華民族。古文獻記載，更證之以考古發掘的研究，中華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，但文化是一元的。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策源地，亦是中華文化的搖籃。在這裏流傳着一些遠古傳說，有巢氏構木爲巢，燧人氏鑽木取火，伏羲氏結繩而爲網罟，以佃以漁，神農氏製作耒耜，教民稼穡。凡此均爲反映我國原始人類社會進化的階段。傳說中的黃帝，是重要人物。古代許多文化成份，都出現于其時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反映當時我國原始人類的物質生活已跨進了文明的門檻。同時，他又是部落聯盟戰爭的勝利者。黃帝戰勝炎帝于阪泉，又戰勝九黎族蚩尤于涿鹿。蚩尤死，九黎族南遷，炎帝族與黃帝族相融合，雄踞黃河流域，繁衍昌盛，成爲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組成部份。以此爲

中心，融合了許多向化的外族，後又逐步擴大，才形成了中華民族現在的局面。後黃帝被中華民族擁戴爲共祖。迄今海內外華人，均自稱爲炎黃子孫。堯舜禪讓，反映原始社會向國家過渡時期，部落聯盟的首長推選制。夏、商、周古代國家逐步形成，古稱“三代”，是三個王朝。已進入歷史時期，三代的歷史記載逐漸明晰。殷代歷史，更有清光緒年間殷墟發現的甲骨卜辭證實。商代可信，以商推夏，亦基本可信。

漢人說，“夏尚忠，商尚鬼，周尚文”，此爲三代之時代精神。尚忠，樸質誠信；尚鬼，宗教玄思；尚文，即于夏商的精神上加以人文化，而文制燦然大備。周文重要的核心內容爲宗法封建制，系由原始社會末期父系家長繼統法演變而來，以嫡長子繼承爲基本特點。周文創制者爲周公旦，史稱“周公制禮”。

宗法制由權力繼承而生。歷史上權力繼承形式多樣，禪讓傳賢，最爲理想。但何人爲賢？尚爭奪，最後必決定于武力，所付代價太大。以血緣繼承，商人兄終弟及；兄弟傳盡，濟之以父死子繼，傳兄之子，抑傳弟之子？周人用父死子繼而法益密。立子以貴不以長，立嫡以長不以賢。繼統之患在爭。任人則爭，任之以天，爭乃不生。實行立嫡長子爲法，于社會秩序穩定，有重大意義。故周代行之，後世繼之而不替，相沿至清。

各層次之權力傳承，均傳嫡長子。天子歿，嗣王繼之；諸侯歿，嗣君繼之。其後均代代相傳。《禮記·大傳》云：“別子爲祖，繼別爲宗，繼嗣者爲小宗。有百世不遷之宗，有五世則遷之宗。百世不遷者，別子之後也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，百世不遷者也。宗其繼高祖者，五世則遷者也。尊祖故

敬宗。敬宗，尊祖之義也。”可知諸嫡次子等之繼統法。諸侯之嫡次子封爲卿大夫，稱別子，分別而出也。別子歿，稱別子爲祖，其嫡長子繼之；繼別者爲大宗。大宗代代相傳，百世不遷。別子之嫡次子歿，稱禰，繼禰者爲小宗，五世則遷。蓋以小宗傳至第五代，必將其高祖上一代之祖，遷至遠祖祧廟中去。小宗只能祭其高祖。此之謂“祖易于上，而宗易于下”。此大小宗之別也。故大宗不斷，而小宗可斷。此意義深遠。如小宗不斷，歲月長久，衆庶日繁，必將成爲獨立的勢力集團。而小宗所尊之祖將與大宗所尊之祖獨立平行，宗法從屬關係有瓦解之虞。爲使小宗之地位，不得與大宗平行，故曰“可斷”。

血緣族群循自然趨勢將日益擴大，權力亦相應地隨之擴大，最不宜分散，有大小宗之別，分矣。乃濟之以禮制上的規定，大宗之宗子有主祭權。《禮記·王制》“支子不祭”。支子不得祭，但有尊祖情緒。尊祖故敬宗，若是，能形成小宗對大宗的向心力，使大宗的權力，得以維持與鞏固。

由親之系統言之，天子之嫡次子爲諸侯，諸侯之嫡次子爲卿大夫，稱別子，其後稱大宗。凡大宗以下，無不奉天子諸侯爲最大之宗。由尊之系統言之，天子諸侯絕宗，《大傳》云：“族人不得以其戚、戚君，位也”。以尊卑既殊，不敢加之以宗，雖絕宗而其實仍在。故《大傳》又云“君有合族之道”。故天子，諸侯，雖無大宗之名，而有大宗之實。即天子、諸侯仍在宗法制之內也。天子、諸侯、大宗，均有主祭其祖之權，而天子更有祭天之權。諸侯等均不得祭天。此天爲人格神之天。天子祭天，其祖配之，體現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古籍中還有：“昭昭之天，塊然之地”。此天爲自然宇宙。《中庸》“天命

之謂性”，爲宇宙生命動源。

關於周禮宗法制繼統法縱貫關係已如上述，茲再略述其橫貫關係，爲繼承父系氏族公社“同姓不婚”而嚴格實行之。《大傳》云：“同姓從宗合族屬，異姓主名治際會，名著而男女有別”。“繫之以姓而弗別，綴之以食而弗殊，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，周道然也”。若是，人始異於禽獸，且有助于族群之擴大。

宗法制的內容，其觀念形態，不外親親之殺，尊尊之等。《大傳》云“自仁率親，等而上之至于祖，名曰輕；自義率祖，順而下之至于禰，名曰重。一輕一重，其義然也”。“是故，人道親親也。親親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收族故宗廟嚴，宗廟嚴故重社稷，重社稷故愛百姓”。以仁言之，子孫愛敬之情，節級而上至于祖，遠者愛敬漸輕，故曰輕；以義言之，循祖順而下之至于禰，禰義漸輕，祖則義重，故曰重。一輕一重，義合如此。在下者，親親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位卑者敬愈多。在上者，敬宗故收族，位高者愛愈廣。故上責仁而下責敬。

親親是人的本能，尊尊只有思想覺悟發展至一定水平始能。尊尊有被尊者，尊之者。被尊者需有公的精神，才能爲人所尊。何者爲公？道義法度是也。宗法制之繼統法，任天而不任人，大公無私，無一毫人欲之私，公開而透明度高，宜爲人所信服。周初宗法制與封建制結合，封君建國之政治形式，湧現出“公”的精神，故嗣王嗣君等能爲族人所尊。

宗法制有大宗小宗之別。小宗可斷，體現愛有差等原則，即親親之殺也。大宗不可斷，體現公私之別，即尊尊之等也。小宗士可降爲庶民，庶民之事爲私，故曰可斷。而大宗

爲國家公事，故不可斷。國重于家，公德重于私德，故親親之孝與尊尊之忠，二者不可兩全時，則全孝而爲忠。忠臣必爲孝子，而孝子不必爲忠臣。由孝子到忠臣，能舍一家之私而進至爲國之大公，實爲人格之飛躍與提升。

家庭爲自然的血緣族群，其關係曰天倫，有父子有親、長幼有序、夫妻有別三者。國家爲積社會成員形成，其關係有君臣有義，朋友有信二者，家國立而五倫備矣。

《論語·八佾》“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”。孔子贊賞周禮而肯定之，並指明“親親仁也，尊尊義也”予周禮以先驗的理論根據。周公制禮，是形式的創造。經孔子自覺反省的解析，提升周禮至理性之高度。于是，周禮全部俱活，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。人的生命，不徒是自然生命，而且還有由心靈表現的理性生命，即道德生命。理性是人之所以爲人之本質與主宰。孔子點出仁是心之德，後孟子十字打開，說得更明晰確切。《孟子·公孫丑》“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。四端即四德，均內在于心。四德要落實，必先有信。此仁義禮智信五德，後稱五常。中國人即本于五常之德，生活在家、國、天下的五倫關係中，爲道德實踐。

家庭成員是天倫的結合。歷史時期，以男性確定親屬關係，家庭成員有父母、己身、妻、兒女，再擴大，自高祖、曾祖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孫、曾孫、玄孫，共九代稱九族。家庭是人們維持生命和延續生命的場所，同時它又是一個經濟單位，爲莊園、店鋪或作坊等，經營農業、商業、手工業等生產，全家衣食，賴之以足。典型家庭，稱“耕讀人家”，大抵爲自耕農，男耕女織。幼兒在散館讀書，聰穎成績佳者繼續深造，其餘參

加農業勞動或其他工作。如此，自然生命得養，文化生命得繼，代代相傳。人在家庭中，衣食無虞，根據志願，得發揮所長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家庭產業公有，各盡其力，各取所需。家庭功能多樣，能應各種需要。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

周公制禮，迄今已三千餘年。其間演變如何？家庭組織，內部蘊有矛盾。各取所需，可勉力解決，而各盡所能，解決殊非易事。物之不齊，物之性也。人能力有大小，工作有勤惰，更有不願工作之家居俟代者，尤進者，惹是生非，影響內外者。親親仁也。手足之情，同胞之義，能互諒互容，一般能維持三世同居，四世，五世，已屬罕觀。此為隨自然發展者，占絕大多數。亦有五世以上者。如唐張公藝百忍，九世同居。而浙江浦江“鄭義門”可謂中國家族史上之奇葩。全族同居十五世，共炊者多達二千餘口。自南宋建炎初（1128年前後）至明大順三年（1459）歷時三百三十餘年，為世之最。終以失火，蔓延全族，而族散分居。創立者為鄭綺，河南滎陽人，精《春秋·穀梁》學，南宋初，南渡定居浦江。遺囑垂訓，子孫不得分家。家人遵而行之，揭櫫“孝義”為躬行準則，故稱“鄭義門”。其後代人才輩出，有功于社會殊多。明太祖稱之為“江南第一家”。人口興旺，迄今浦江有鄭姓一萬四千餘人，幾半數居于原處鄭宅鎮。《紅樓夢》之所寫，不足以代表中國家庭。它是衰世之音。看看鄭義門一家人，男耕女織，讀書者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的行誼，全家人英挺的生活着，富有朝氣。雖有時代局限性，但從中可獲若干向上的啓發。

中國人的家，寬容舒適，和諧自在。人在家中，可進可

退，能有立而無限，故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。

中國人的國家觀念，以秦統一爲界綫，先秦與其後截然不同。先秦時期，國人對國家是很重視的。自夏代起，國家已具規範，歷商至周，已成爲像樣的大國。西周初，周公制禮，宗法封建制度的確立，一時諸侯國家興起。當時的國家，無異於家庭的擴大。國與家關係密切，國人既重家，當然也重視國。諸侯國盡力開發土地，進行生產，國力日漸充實，國境迅速擴張。及平王東遷，王命不行。諸侯間兼併戰爭紛起，國家意識益形增強。至戰國時期，達至高峰。此于荆軻刺秦王，屈原之愛國詩篇等，得到反映。

秦統一後，國人的國家觀念便日趨澹薄、模糊、混亂以至達到似有還無，似無還有的程度。其主要原因，爲有幾種思想起着作用：一、秦滅六國，廢宗法封建制，改君主專制郡縣制。舊時封國已滅迹，新封國無由產生，秦不旋踵而覆亡。漢因秦制，此大一統之中國已確立。當時士人認爲，此大一統之國家，已不同于舊時諸侯演變而成的國家，乃爲“天下”，是超乎國家之上的。其主張非“國家至上”、“民族至上”，而是“文化至上”，思想趨向于文化世界主義，反對功利的國家主義。于是，國家意識漸形沉沒。此“文化至上”，所指爲中國文化。將中國天下觀與中國文化觀聯在一起。其後二千餘年，大率如是。直至明清之際，顧炎武所說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實仍指爲中國文化之興亡。明亡于清，深感“被髮左衽”之痛，而發出的呼籲。經二千餘年漫長歲月，時移勢異，今古迥別。仍將先秦的“天下”、“國家”觀，同之于後世。未分析其內涵實質，混淆不清，流弊殊大，影響深遠。二、無爲而治思想。春秋至戰國是中國社會變動劇烈時期。井田

制廢棄，民間土地自由買賣，國家履畝而稅，封建制度逐漸崩潰。秦統一全國，改宗法封建制為君主專制郡縣制。皇帝至高無上，權力無限。但從另意義看，皇帝失去封建貴族基礎，君臨天下廣土衆民，變成了真正的“孤家寡人”，情危而勢孤。一人如何去統治偌大的國家？依靠中央權貴，他們無土地，無人民，沒有真正實力。用出身民間的士人治理國家，他們任職有期，終要離職或告老還鄉，不可靠。因此，皇帝只有依靠人民，以人民的利益為中心，才能坐穩江山。俗語稱“得民心者昌，失民心者亡”。故自漢代以來，施政均以安民為主旨，政簡刑清，寬以待民，實行“無為而治”。三、中華民族熱愛和平，理想是和諧社會，能够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。此即“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”。胸懷寬大，“萬物並生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”。其民族政策，“入中國則中國之”，不敵視，不歧視。宗教信仰自由，不是信奉一神教，而排斥其他一切宗教，多種宗教並存。國際社會和諧相處，絕不強凌弱，大併小。認為每個國家或民族，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的貢獻。滅人之國，是不道德的；消滅一種文化，是人類的損失。《春秋》大義更提出積極主張“興滅國，繼絕世”，如現在之保護珍稀生物品種一樣，去扶殖弱勢文化，使能再度繁榮發展起來，為人類作出貢獻。

在以上幾種思想作用下，秦漢以後的中國國家職能實施情況如何呢？國家職能主要者不外三事，曰食、教、衛。食為經濟生產消費之事。其時生產力低下，自給自足。不需要國家領導，人民能够自理。而且經驗證明，干預經濟活動，如王莽改制，王安石變法，姑勿論其動機若何，結果均為一團糟。故國家干預民間事務特少。自漢以降，均採取無為而治，人

民與官府關係，幾僅爲納糧、服役二事。後者需要時不多，故只納糧一事。故諺語有云“交了糧，自在王”。至于教，國家于首都辦太學外，地方均爲自由辦學，即鄉學或私塾。國家爲剛性組織，負責防禦外敵入侵，平抑內部騷亂。對外主要用對話，對內主要用教育。教育對話失效時，才動用武力。武力則用兵。但中國是無兵之國。（不是絕對無兵，僅有少量兵守衛國都、邊防要地而已。在大片國土上見不到兵。）故外人有謂中國無武備，不是國家，而是社會。何以成爲無兵之國？中國是東亞第一大國，“萬國衣冠拜冕旒”，周邊小國都來朝貢，偶有邊境侵擾，派偏師即可濟事，不必興師動衆。歷史時期，地廣人稀，不遇水旱荒年，均可家給人足。人民安居樂業，地方治安良好，爲盜者寡。如西漢文景之治，幾至刑措；唐貞觀年間，一年判死刑者不到十人。如此情況，不需要兵。至于說歷史上的一治一亂的亂世，承平日久，官府腐敗，土地兼併，地主剝削逾限，如遇災荒，農民大起義爆發，則全國到處是兵。但時間不長，又平靖下來。這是變態。無爲而治，無兵之國，則是常態。故國家職能隱而不顯，使人感不到國家存在，因此人民對國家不重視，國家觀念因而澹薄。如此情況，亘二千餘年之久。直到 1842 年鴉片戰爭失敗，爲救亡圖存，志士仁人，奔走呼號，國家意識才得增強。但同時出現不諧之音，即康有爲《大同書》，倡超國家之天下意識，甚有負面作用。今世界列國並立，局勢詭譎多變，我國處其間，亟應增強國家意識，激揚愛國熱忱。

家庭與國家，爲禮的兩個主要架構，還需要道德規範貫通其間。依各人在家庭、國家所處地位，按雙方關係，確立其名份及行爲準則，此禮之所由生也。此行爲準則，即爲道德

規範。人遵禮而行，使禮運行，家庭、國家職能始顯。《禮記》爲記載禮之架構及道德規範，並闡發其涵義之著作也。或曰，此乃古禮，今日適用否？答云，關於此，《大傳》言之甚明：立權度量，考文章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異器械，別衣服，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……親親也，尊尊也，長長也，男女有別，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。”此即謂禮文須與時俱進，因時損益，而禮意則始終如一，不得變革。如三年之喪，居今難以實行，當然不必泥古，但必盡力而爲，盡心而行，務使心安理得。

最後試對中國文化之真實精神及其優越性簡略言之。世界古老文明國家，有埃及、巴比倫、印度、中國。前三個國家，早已消逝在漫長的歲月中，只有中國蔚然獨存，屹立于東亞大地之上，朝氣蓬勃地仍與現代各國並列。西哲黑格爾說，中華民族處于幼稚狀態。弗希特說，中華民族，是最具原始性的民族。一個古老民族，能不衰老，其國家能于衆亡之中而獨存，何以故？值得深思。以宗教爲信仰中心，凝聚成一個民族，在世界歷史中，實爲多見。但中國非如此。中華民族從一開始，即擺脫迷信低級形式，不祈求于神，而自信人本身，開出人文型文化。以人爲本，關愛生命。人之生命，本出于天。乾者，天也。《易·乾·彖辭》“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”，人亦如之。天之所予爲命，人之所受爲性；性命渾然而一體，故人有性有命。即人不僅有自然生命，而且有理性生命，亦即道德生命或文化生命。《易·繫辭》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而人心遙契天德，故《易·乾·大象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。“明出地上，君子以自昭明德”。人能自覺地自強不息，暢于四體，發于事業，必能德業日隆。《繫辭》“富有之謂大業，日

新之謂盛德，生生之謂易”。與時俱進，於穆不已。故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強大，能永葆美妙之青春，歷久而不衰。世界上，各民族之文化，率能美盛如花，但只能開一次，便消逝于歷史過程中。而中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花開花落，一次次永遠開下去。明陳白沙詩云“無極老翁無極數，一番拈動一番新”。此為非常特異之現象，已逐步為中外學人所共識。識乎此，便不應妄自菲薄，更不應鑿傷中華民族之正氣。炎黃子孫勉乎哉！

一般言文化者多論文化之業績，此則言創造文化業績，決定文化方向之“人”。

答問既已，爰及其書。《譯注》作者潛君，青年讀書時，樸誠篤實，勤學精進，有器識，知其必將有成。升入杭州大學中文系，由於志趣不同，捨語言、文學而向往經籍與諸子之學，於是而先後得王駕吾先生、沈文倬先生兩師長期指導，獲益良多。

1960年畢業後，回故鄉嵊州市任教。工作盡職負責，極認真，又更刻苦讀書，以“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”自勉。數十年來，幾無片時之暇，誠為“焚膏油以繼晷，恒兀兀以窮年”。在泛讀中，漸以《禮記》為重，初欲為《禮記選讀》，得王師贊賞。後又得沈師悉心指導，最後乃選用清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為底本，撰寫《禮記譯注》，歷十年而書成。

聊述數語，是為序。

望九老人 楊鈞

二〇〇六年三月于蕭山

前 言

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數千年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，更如近代以來屢遭侵凌而不倒，究其原因，並不在於生存地域之封閉，也不在於種族血緣之純一，而在於文化精神之一貫，與其思想之精深和其積累之豐厚。馬一浮氏曾謂：“國之所賴以存者，不在物質，而在精神。”（《馬一浮集》第二冊，第 597 頁）

中華民族之精神文化起源甚早，至夏商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所偏；至周匯而成之，顯示其既切實又超越的“人文精神”。孔子“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”，正謂從其“人文精神”，而人文精神，又以禮樂文明為載體，通過禮樂而顯現。

禮主別異，樂主和同，正為仁之呈現。此禮學之大要，其載體為“五經”，而以《禮》最具綜合性。

一

馬一浮氏曾謂：“二戴諸篇皆七十子後學所傳，非漢之博士所能附益。”（《馬一浮集》第一冊，第 139 頁）二戴所輯大部分是《儀禮》今存之十七篇以及已佚之若干篇的傳記，亦即依據《儀禮》諸篇，為解經所未明，補經所未備而作。故《漢書·藝文志》禮類“記百三十一篇”，班固自注“七十子後學者所記”。可以認為，七十子後學所撰之“記”，一直單篇流傳，至西漢才為二戴所輯錄。